

东晋“儒官”的设职、选任及其政治性

李磊

摘要:东晋太学建于司马睿称帝的前一年(317),国学立于咸康三年(337)。国学在永和八年(352)遭到罢废后,又于太元九年(384)重建。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,再到十一博士制、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。太学、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,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。东晋前中期,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。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笼络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。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颍川庾氏,则以荐举江州人物来争取民心。淝水之战后,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、国学的政治象征性,被孝武帝加以凸显并运用在与门阀的政治博弈中。

关键词:东晋;儒官;博士;太学;国学

DOI: 10.16382/j.cnki.1000-5579.2022.02.007

东晋太学建立于建武元年(317),早于司马睿称帝(太兴元年,318)。东晋的太学博士制度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,再发展为十一博士制,最后为十六博士制。除太学外,东晋还在咸康三年(337)、太元九年(384)两度兴建国学。终东晋之世,兴学均是重要的政治议题。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,^①考察东晋太学博士、国子博士的设职与选任,以及国学的兴复过程,通过阐发其所处的政治脉络,呈现东晋学术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。

一 东晋太学博士、国子博士的设立

建武元年(317)十一月东晋立太学,^②但在立学后的两年时间里似未能开展教学活动,故而引发太兴二年(319)应詹的上疏:“今虽有儒官,教养未备,非所以长育人材,纳之轨物也。”^③

【作者简介】李磊,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(上海,200241)。

【基金项目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东晋南朝的江南文化”(项目编号:2019BLS006)。

① 有关东晋官学及学官的研究参见:柳诒徵:《南朝太学考》,《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352—442页。吕思勉: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丙帙《魏晋南北朝》549“国子太学”条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,第992—995页。高明士:《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》第一章《汉唐间学校教育发展的特质》第二节《两晋南北朝时代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,第40—73页。[日]古胜隆一:「南齐の国学と积奠」,宇佐美文理编:《六朝隋唐精神史の研究》(科学研究费補助金、研究成果報告書),2005年,第107—123页。[日]古胜隆一:《论魏晋南北朝之释奠》,余欣主编:《中古时代的礼仪、宗教与制度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165—178页。张连生:《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》,《史学集刊》2006年第5期。吴秉勋:《魏晋南北朝“庙学”制度研究》,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班学位论文,2017年6月。

② 《晋书》卷六《中宗元帝纪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149页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七〇《应詹传》,第1859页。

疏文以“儒官”指称太学博士。博士称为“儒官”，自西汉而然。《汉书·师丹传》载给事中博士申咸、炅钦上书后，遭尚书弹劾，称其“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”^①，“儒官”即指博士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太和二年(228)六月诏称“儒官或非其人”，因而要“高选博士”，“申敕郡国，贡士以经学为先”^②。西晋时，曹志在奏议中自称“备位儒官”，其在咸宁初因“笃学履素、达学通识，宜在儒林，以弘胄子之教”，被诏选为国子博士。^③故汉魏晋以来，儒官例称中央官学师资。^④

关于东晋太学博士的员额，《晋书·元帝纪》言太兴二年(319)六月丙子“置博士员五人”^⑤。《通典》卷五三《礼十三·沿革十三·吉礼十二》载太常贺循的上言：“尚书被符，经置博士一人。又多故历纪，儒道荒废，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。且《春秋》三传，俱出圣人，而义归不同，自前代通儒，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。况今学义甚颓，不可令一人总之。今宜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二经置博士二人，《春秋》三传置博士三人，其余则经置一人，合八人。”^⑥贺循所言“尚书被符，经置博士一人”，即五经各一人。按《晋书·元帝纪》，太兴二年六月己亥“加太常贺循开府仪同三司”，“秋七月乙丑，太常贺循卒”^⑦。可知贺循的上言在该年六七月间，针对的正是“置博士员五人”的情况。贺循建议在此基础上加置三人：《礼》增一人，共置二博士(《周礼》《仪礼》)，“《春秋》三传”增二人即“置博士三人”，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仍各置一博士，“合八人(博士)”^⑧。

继贺循任太常的荀崧在“方修学校，简省博士”之时上长疏，疏文有言：“博士旧员十有九人，今五经合九人。”^⑨关于博士九人，《宋书·百官志上》云“皆不知掌何经”^⑩，但《宋书·礼志一》、《晋书·荀崧传》却予以了明确记载，兹引《宋书·礼志一》如下：

太兴初，议欲修立学校，唯《周易》王氏、《尚书》郑氏、《古文》孔氏、《毛诗》郑氏、《周官》郑氏、《礼记》郑氏、《论语》郑氏、《春秋左传》杜氏、服氏，各置博士一人。其《仪礼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及郑《易》，皆省不置博士。^⑪

可知“议欲修立学校”时的九博士为：《周易》王氏，《尚书》郑氏，《古文》孔氏，《毛诗》郑氏，《周官》郑氏，《礼记》郑氏，《春秋左传》杜氏，《春秋左传》服氏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郑氏。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虽非五经，但自两汉以来很受重视，故东晋加置博士。^⑫贺循上言加置的《仪礼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与郑《易》“皆省不置博士”。

荀崧疏文说：“准古计今，犹未中半。九人以外，犹宜增四。”^⑬荀崧认为，东晋将西晋十九博士制改为九博士制，遵循的是“节省之制”，但依据“三分置二”的“节省之制”，还当增加四博士。四博

① 《汉书》卷八六《师丹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3507页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三《魏书·明帝纪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94页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五〇《曹志传》，第1390—1391页。

④⑧⑫ 此点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指教。

⑤⑦ 《晋书》卷六《中宗元帝纪》，第152页。

⑥ 《通典》卷五三《礼十三·沿革十三·吉礼十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1465页。

⑨ 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361页。《晋书》卷七五《荀崧传》所载疏文，文字略有不同：“博士旧置十九人，今五经合九人。”第1977页。

⑩ 《宋书》卷三九《百官志上》，第1228页。

⑪⑬ 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，第360页；第361页。

士分别是郑《易》、郑《仪礼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^①。除了贺循曾建议的《仪礼》、《春秋》公羊、穀梁二传外,又加置了郑《易》。太学博士文属太常,^②依照“节省之制”为“儒官”争取更多员额乃太常职责所在。荀崧的建议得到晋元帝的支持,晋元帝表示:“崧表如此,皆经国大务,而为治所由。……可共博议之。”据《宋书·礼志一》,在“有司奏宜如崧表”后,元帝下诏:“《穀梁》肤浅,不足立博士。余如所奏。”^③

《宋书·礼志一》、《晋书·荀崧传》均提到“会王敦之难,事不施行”^④。王敦举兵向阙的时间是永昌元年(322),而《晋书·元帝纪》载太兴四年(321)三月“置周易、仪礼、公羊博士”^⑤,这一记载与元帝将九博士增为十二博士的诏书相印证。《宋书·百官志上》的记述是:“元帝末,增《仪礼》、《春秋公羊》博士各一人,合为十一人。”^⑥晋元帝崩于永昌元年,太兴四年亦属“元帝末”。《宋书·百官志上》不载郑《易》博士的增置,故认为元帝末从九博士制发展到十一博士制。

东晋置博士尽管事有曲折,但总的趋势却是博士员额不断增加。《宋书·百官志上》云:“后又增为十六人,不复分掌五经,而谓之太学博士也。秩六百石。”^⑦这与元帝君臣将立学视为“经国大务”“为治所由”有关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云:“于时司空王导启立学校,选天下明经之士,(任)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。事未行,会有王敦之难,寻而帝崩,事遂寝。”^⑧王导出任司空的时间是太兴四年七月壬午,^⑨王敦之难兴于永昌元年正月戊辰,终于四月,^⑩可知“选天下明经之士”是在太兴四年下半年,正在十一博士制形成之后。

“选天下明经之士”因王敦之难而中止,晋明帝太宁三年(325)三月癸巳再发诏书“征处士临海任旭、会稽虞喜并为博士”^⑪。然而根据晋成帝时袁瓌的上疏,直至咸康三年(337)情况仍然是“儒林之教暂颓,庠序之礼有阙,国学索然,坟卷莫启,有心之徒,抱志无由”。袁瓌为此呼吁朝廷:“实宜留心经籍,阐明学义,使讽颂之音,盈于京室,味道之贤,是则是咏,岂不盛哉!”^⑫

有关“儒林之教”的呼声,是为咸康年间兴文教所作的舆论动员。咸康元年晋成帝亲释奠,咸康三年太学改址至秦淮水南。^⑬在袁瓌上疏的同一年,国学设立。^⑭按《晋书·职官志》,“及咸宁四年,武帝初立国子学,定置国子祭酒、博士各一人,助教十五人”^⑮。采取“三分置二”“节省之制”的东晋应保留国子祭酒、国子博士一人与助教十人的编制。

史籍所见国子博士、太学博士的征召事例,有不少集中于咸康三年之后的几年里。如翟汤,“咸康中,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,成帝征为国子博士”^⑯。郭翻“与翟汤俱为庾亮所荐,公车博士征”^⑰。因国子博士定额一人,翟汤既已被征为国子博士,与他一同被征的郭翻或许是太学博士。范宣,“太尉

① 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,第361—362页。《晋书》卷七五《荀崧传》,第1977—1978页。

②⑬ 《晋书》卷二四《职官志》,第735页;第736页。

③④ 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,第362页。《晋书》卷七五《荀崧传》所载文字略有差异,第1978页。

⑤⑨⑩ 《晋书》卷六《中宗元帝纪》,第154页;第154页;第155页。

⑥⑦ 《宋书》卷三九《百官志上》,第1228页。

⑧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任旭传》,第2439页。

⑪ 《晋书》卷六《肃宗明帝纪》,第163页。

⑫ 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,第362—363页。

⑬ 李磊:《四世纪的“崇圣”竞争与东晋太学、国学之兴废》,《孔子研究》2021年第1期。

⑭ 《晋书》卷八三《袁瓌传》:“疏奏,成帝从之。国学之兴,自瓌始也。”第2167页。

⑯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翟汤传》,第2445页。

⑰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郭翻传》,第2446页。

郗鉴命为主簿,诏征太学博士”^①。郗鉴任太尉的时间是咸康四年至五年(338—339),^②范宣被征为太学博士当在此期间。又按《晋书·隐逸传》,“咸康中,成帝博求异行之士,(刘)颯、(郗)郁并被公卿荐举,于是依(韩)绩及翟汤等例,以博士征之。”^③韩绩是在咸康年间被召拜为博士的。^④

王导、庾亮分别死于咸康五年与六年。此后参预朝政的是庾冰、何充、诸葛恢。咸康八年成帝崩、康帝即位,“委政于庾冰、何充”^⑤。在成、康、穆三朝更迭之际,执政的庾冰、何充延续了王导、庾亮的政策。会稽山阴谢沈,“何充、庾冰并称沈有史才,迁著作郎,撰《晋书》三十余卷”^⑥。广陵高崧除太学博士,再拜为中书郎、黄门侍郎,也是缘于“司空何充称其明惠”^⑦。但国学的办学时间仅有十五年,永和八年(352)殷浩西征,国学便因军兴而遭罢废。^⑧复建要留待淝水之战以后了。

二 东晋博士征召中的学术、地缘与门阀因素

太宁三年(325)三月癸巳诏书叙述了征召任旭、虞喜的缘由,诏书言:

夫兴化致政,莫尚乎崇道教,明退素也。丧乱以来,儒雅陵夷,每览子衿之诗,未尝不慨然。临海任旭、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,岁寒不移,研精坟典,居今行古,志操足以励俗,博学足以明道,前虽不至,其更以博士征之。^⑨

诏书包括两个方面的评价:一是肯定了任旭、虞喜的经学成就(“研精坟典”、“博学足以明道”),表彰他们专注于学问的态度(“洁静其操,岁寒不移”);二是认为这种学术成就与人生态度能够影响士风(“志操足以励俗”),以助“兴化致政”。虞喜的成就主要在对《周官》与《论语》郑玄注的研究上,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其撰有《周官驳难》三卷、《新书对张论》十卷,并为《论语》郑玄注作赞。^⑩《周官》、《论语》郑氏均在元帝太兴年间的九博士之列,可见太兴四年、太宁三年的博士选任是依所立之经“选天下明经之士”。

元、明、成、康、穆帝之世的博士选任,一直以明经为重要标准。咸康年间的博士范宣,“博综众书,尤善三礼”^⑪,撰有《礼记音》二卷。^⑫谢沈被征召的缘由是:“康帝即位,朝议疑七庙迭毁,乃以太学博士征,以质疑滞”^⑬。永和年间的博士曹耽是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专家,撰有《礼记音》二卷、《春秋左氏传音》四卷。^⑭博士荀讷专于《左传》,参与编撰《春秋左氏传音》四卷。^⑮升平年间的博士胡讷撰有《春秋穀梁传集解》十卷、《春秋三传评》十卷、《春秋集三传经解》十卷。^⑯胡讷对春秋三传均有研究,由于《穀梁》不列于学官,所任博士当与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有关。

①⑪ 《晋书》卷九一《儒林·范宣传》,第2360页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七《显宗成帝纪》,第181—182页。

③④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韩绩传》,第2444页;第2443页。

⑤ 《晋书》卷七《康帝纪》,第184页。

⑥ 《晋书》卷八二《谢沈传》,第2151—2152页。

⑦ 《晋书》卷七一《高崧传》,第1894—1895页。

⑧ 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,第363页。

⑨ 《晋书》卷九一《儒林·虞喜传》,第2348—2349页。

⑩⑫⑬⑭⑮ 《隋书》卷三二《经籍志一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3年,第919、935、937页;第922页;第922、928页;第928页;第931—932页。

⑯ 《晋书》卷八二《谢沈传》,第2152页。

《晋书·明帝纪》记任旭、虞喜的身份为处士，^①癸巳诏书表彰他们“洁静其操，岁寒不移”。东晋征召的太学博士、国子博士有不少是《晋书·隐逸传》的传主，如郭翻、翟汤、刘夔、邴郁、韩绩等。他们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名望，乃至闻于朝廷，就是由于着意不交当权人物、不应征召。在政治文化语境中，处士应征是东晋朝廷德政的彰显。征召处士的时机，则由当日的政治需求所定。博士征召的意义既在于政治宣传，也是扩大统治基础的一种手段。太兴四年(321)、太宁三年(325)两次征召任旭、虞喜，实是建康朝廷借“选天下明经之士”，将旧吴大族纳入政权之中，借以扩大统治基础。^②虞喜之父为孙吴征虏将军。在两次王敦之难中，会稽虞氏均站在了建康朝廷一方。王敦第二次举兵时，虞喜族人虞潭“于本县招合宗人，及郡中大姓，共起义军，众以万数”，“乃进赴国难”^③。又据《晋书·贺循附杨方传》，“时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，雅爱(杨)方，为之延誉”，贺循“遂称方于京师，司徒王导辟为掾”，“搢绅之士咸厚遇之”^④。贺循为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，被王导称为“此土之望”^⑤。他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协调侨吴士族，有拥立之功。^⑥虞喜与贺循同在江东士族的交际网络之中，故能推荐寒士杨方，使之跻身士流。任旭的情况与虞喜类似。任旭为临海章安人，其父任访是孙吴南海太守。西晋时，任旭“察孝廉，除郎中，州郡仍举为郡中正”^⑦。临海任氏自吴至晋一直是本郡大姓，故而任旭被州郡举为郡中正。司马睿过江后，屡次召辟任旭为掾属，大概缘于江东政局尚未稳定，任旭一直没有应召。晋元帝、晋明帝一再表彰并征召虞喜、任旭，与笼络会稽虞氏、临海任氏的政治考虑有关。

在咸康年间的博士征召中，江东士族依然是重要对象。韩绩“广陵人也，其先避乱，居于吴之嘉兴，父建，仕吴至大鸿胪”^⑧。韩绩先人迁徙吴郡嘉兴县的时间不详，但从韩建位居孙吴九卿可知，至晚在三国时代韩氏已是吴郡大姓。《晋书》本传以“东土并宗敬焉”来表述韩绩在江东士族中的名望。举荐韩绩的孔愉，祖孔竺为孙吴豫章太守，父孔恬为湘东太守，从兄孔侃为大司农。^⑨孔愉曾因反对王导对护军的人事任命，“由是为导所衔”^⑩。王导死于咸康五年，孔愉出任会稽内史的时间在咸康五年至八年间(339—342)。^⑪他上疏举荐韩绩，或许是趁建康政局变动为旧吴士族提供政治机遇。在接受孔愉的举荐后，朝廷“诏以安车束帛征之”^⑫。安车，本供年老的高官或贵妇乘用。安车束帛则用以征召德高望重且年尊者，如吕后之依张良策迎四皓，汉武时迎八十余岁之鲁诗专家申公。朝廷以安车束帛征韩绩，表现对他足够重视之意。时任尚书令的诸葛恢与王导同出琅邪，为侨姓士族的政治代表，他以“名望犹轻，未宜备礼”为由阻止了安车束帛之礼。即便如此，对未入仕的韩绩以太学博士相征已经是很高的礼遇，太学博士是与扬州主簿、王国侍郎、奉朝请等并列的起家官。^⑬

成、康之际被征为太学博士的谢沈，出身会稽山阴谢氏。曾祖谢斐为孙吴豫章太守，父谢秀为孙

① 《晋书》卷六《肃宗明帝纪》，第163页。

② 方北辰先生认为江东士族在王敦之难中的表现，反映了他们对东晋政治权利分配的不满。参见方北辰：《魏晋南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》第三章第二节，台北：天津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66—81页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七六《虞潭传》，第2013页。

④ 《晋书》卷六八《贺循传附杨方传》，第1831页。

⑤ 《晋书》卷六五《王导传》，第1746页。

⑥ 陈寅恪：《述东晋王导之功业》，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55—77页。

⑦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任旭传》，第2439页。

⑧⑨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韩绩传》，第2443页。

⑩⑪ 《晋书》卷七八《孔愉传》，第2051页；第2053页。

⑫ 余晓栋、胡祖平：《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320页。

⑬ 此点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指教。

吴翼正都尉,^①翼正都尉为孙吴太子近侍。^②同出会稽谢氏的谢敷,“性澄靖寡欲,入太平山十余年,镇军郗愔召为主簿,台征博士”^③。郗愔为镇军大将军在太元元年至六年(376—381),朝廷仍以博士征召会稽谢氏人物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载:

初,月犯少微,少微一名处士星,占者以隐士当之。谯国戴逵有美才,人或忧之。俄而(谢)敷死,故会稽人士以嘲吴人云:“吴中高士,便是求死不得死。”^④

戴逵为侨姓隐士,与琅邪王珣、王徽之交往密切。有人作云中诗为戴逵出仕制造舆论,诗文言“东山安道,执操高抗,何不征之,以为朝匠”^⑤,呼吁以之为“朝匠”。《晋书·隐逸·戴逵传》:“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。……孝武帝时,以散骑常侍、国子博士累征,辞疾不就。郡县敦逼不已,乃逃于吴。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,逵潜诣之,与珣游处积旬。”会稽内史谢玄“虑逵远遁不反”,乃上疏请绝征召戴逵之命,从而使其复还会稽剡县。^⑥会稽人士以“吴中高士”之言嘲讽戴逵“远遁(吴)不反(会稽)”,反映了东晋门阀社会中吴郡与会稽的矛盾。

苏峻之难后,东晋虽然趋向于稳定,但门阀内部的阶层分野却也日趋分明。较之江东士族的内部矛盾,江东士族与侨姓士族间的矛盾更为根本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载:

张凭举孝廉出都,负其才气,谓必参时彦。欲诣刘尹,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。张遂诣刘。刘洗濯料事,处之下坐,惟通寒暑,神意不接。张欲自发无端。顷之,长史诸贤来清言。客主有所不通处,张乃遥于末坐判之,言约旨远,足畅彼我之怀,一坐皆惊。真长延之上坐,清言弥日,因留宿至晓。张退,刘曰:“卿且去,正当取卿共诣抚军。”张还船,同侣问何处宿?张笑而不答。须臾,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,同侣惋愕。即同载诣抚军。至门,刘前进谓抚军曰:“下官今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!”既前,抚军与之话言,咨嗟称善曰:“张凭勃宰为理窟。”即用为太常博士。^⑦

吴郡张氏是江东士族中的高门,张凭祖父张镇曾任苍梧太守,^⑧但从“举孝廉”的人仕途径来看,他未预高流官序,故而“负其才气,谓必参时彦”,主动寻求名士领袖刘惔的赏识。刘惔活跃于咸康至永和年间。^⑨简文帝咸康六年(340)为抚军将军,永和元年(345)进位为抚军大将军、录尚书六条事,永和二年(346)与司徒蔡谟并辅政。《宋书·礼志三》载张凭曾在永和二年(346)七月以博士身份参与礼议,^⑩可知张凭拜谒刘惔的时间在永和元年至二年间(345—346)。永和元年至十年(345—354)的东晋政坛缺乏琅邪王氏、颍川庾氏这样的主导士族,门户之争处于相持阶段,^⑪侨、吴间的士林交往呈现平和、宽容之态,此时的人物识鉴受到侨姓名士的观念影响。《晋书·刘惔传》:“(刘惔)尝荐吴郡

① 《晋书》卷八二《谢沈传》,第2151页。

② 刘雅君:《从吴王到皇帝——孙吴立国江东与六朝政治统绪的形成》,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0年第1期。

③④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谢敷传》,第2456—2457页;第2457页。

⑤ 《晋书》卷六四《会稽文孝王道子传》,第1735页。

⑥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戴逵传》,第2457—2459页。

⑦ 余嘉锡先生指出这段史料出自《郭子》,参见《世说新语笺疏》上卷下《文学第四》“张凭举孝廉出都”条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235—236页。

⑧ 《晋书》卷七五《张凭传》,第1992页。

⑨ 胡秋银、刘浩:《论永和人物——以刘惔为例》,《安徽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8年第2期。

⑩ 《宋书》卷一六《礼志三》,第451页。

⑪ 田余庆:《东晋门阀政治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6年,第140—198页。

张凭，凭卒为美士，众以此服其知人。”^①张凭之所以有“美士”之称，在于过人的玄学清谈（“清言”）才能得到刘惔的赏誉。而刘惔认为张凭是“太常博士妙选”，则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儒学是玄谈化的儒学。玄学清谈名士对博士等“儒官”的要求是礼玄双修。^②

吴郡士族的地位要高于会稽士族，出身吴郡高门者尚且要迎合侨姓士风，会稽士族的处境可想而知。在见诸记载的博士征召中，会稽处士占有相当比例，正表明博士征召是朝廷安抚会稽士族的一种方式。与之类似，庾氏、桓氏主政上游方镇时，所荐举的博士有不少是江州、荆州人物。前述咸康中被庾亮上疏荐为国子博士的翟汤为江州寻阳人。按《晋书》本传，“建元初，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，大发僮客以充戎役，敕有司特蠲（翟）汤所调”^③。由于翟汤并未应征博士，庾翼大发僮客时，他仍是处士。庾氏为了表示对治下名士的尊重，故而请朝廷敕书蠲免翟汤之调。与翟汤一同被征召的郭翻是江州武昌人，“伯父讷，广州刺史，父察，安城太守”^④。西晋时，郭讷与贺循一同被陆机上书推荐入洛为官。^⑤杜弢之难中，郭讷、郭察代表荆州、江州、湘州本土势力与之斗争。《晋书·杜弢传》载：“广州刺史郭讷遣始兴太守严佐率众攻（杜）弢，弢逆击破之”，“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领州事，因率众讨弢，反为所败，察死之。弢遂南破零陵，东侵武昌，害长沙太守崔敷、宜都太守杜鉴、邵陵太守郑融等。”^⑥武昌郭氏在杜弢之难中遭到沉重打击，郭察死于永嘉五年，^⑦郭讷亦被广州土著势力所背弃。^⑧《晋书》云“（郭）翻少有志操，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，家于临川，不交世事”^⑨。临川郡于元康元年由扬州转隶江州。^⑩郭翻“家于临川”，当是郭察、郭讷失败后，武昌郭氏迁徙避难的结果。咸康年间庾亮举荐的翟汤、郭翻均是居住于江州的名士，而江州正是庾氏与王氏争夺的焦点。庾亮试图通过举荐处士以获取江州士庶的支持。咸康六年庾亮死后，王允之居江州刺史之位，江州落入琅邪王氏掌控中。经过复杂的斗争，庾冰于建元元年（343）外镇武昌，领江州刺史，江州重归庾氏。^⑪庾翼在此时请敕特蠲翟汤所调，正是延续庾亮争取江州人心的政策。

综上所述，东晋的博士征召以明经处士为对象，这些处士大多为会稽、江州人物。征召会稽士族，是因为他们在门阀制度下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，但又拥有政治军事势力，故以博士征召相笼络。征召江州处士主要缘于颍川庾氏的荐举。在与王氏相争江州的背景下，庾氏的这些荐举旨在争取江州民意。可见东晋征召博士以“兴化致政”，背后还具有切实的政治考量。

三 孝武帝“兴复国学”及其政治考量

太元八年（383）的淝水之战不仅是北方政治的转折，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转折。太元九年尚书令谢石上疏请“兴复国学”及“普修乡校”，孝武帝随即兴复了已于永和八年（352）罢遣的国学。此次

① 《晋书》卷七五《刘惔传》，第1991页。

② 此点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指教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翟汤传》，第2445页。

④⑨ 《晋书》卷九四《隐逸·郭翻传》，第2446页。

⑤ 《晋书》卷六八《贺循传》，第1824—1825页。

⑥ 《晋书》卷一〇〇《杜弢传》，第2621页。

⑦ 《晋书》卷五《孝怀帝纪》，第122页。

⑧ 《晋书》卷一〇〇《王机传》，第2624页。

⑩ 胡阿祥、孔祥军、徐成：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三国两晋南朝卷》（上）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749页。

⑪ 田余庆：《东晋门阀政治》，第114—131页。

“兴复国学”的政治意义与以往有别。如上文所述,东晋建太学与国学具有“兴化致政”的宣传意义,并以博士等“儒官”为政治资源笼络会稽、江州人物。孝武帝“兴复国学”的着眼点不在于以文教宣扬正朔,也不在于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,而在于皇权与门阀关系。谢石疏文说:

今皇威遐震,戎车方静,将洒玄风于四区,导斯民于至德。岂可不弘敷礼乐,使焕乎可观。请兴复国学,以训胄子;班下州郡,普修乡校。雕琢琳琅,和宝必至,大启群蒙,茂兹成德。匪懈于事,必由之以通,则人竞其业,道隆学备矣。^①

谢石认为淝水之战取胜后,“兴复国学”是展现孝武帝“皇威”的重要举措,对外“洒玄风于四区”,对内“导斯民于至德”。谢石为谢安之弟,这一上疏代表了谢安的意见。《宋书·臧焘传》将“立国学”看作是谢安的举措,“晋孝武帝太元中,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,徐、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”^②。正因国学为谢安所倡,谢氏子弟才配合物色“儒官”人选。臧焘出任国子助教即为谢玄所推荐。

国学兴复后,孝武帝以陈郡殷茂为国子祭酒,以车胤领国子博士,在人事上排斥了谢氏。早在淝水之战进行时,孝武帝“诏司徒、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”^③,以分谢安之权。《晋书·谢安传》云:“(谢)安以父子皆著大勋,恐为朝廷所疑”,“时会稽王道子专权,而奸谄颇相扇构,安出镇广陵之步丘,筑垒曰新城以避之”^④。谢安已意识到“为朝廷所疑”,提议“兴复国学”便是为了寻求与皇权的妥协。

出任国子祭酒的殷茂出身高门士族。孝武帝自即位始便与殷氏关系密切。宁康元年(373)殷康任左卫将军,他在“妖贼卢悚入宫”案中立下大功。^⑤宁康二年(374)殷茂已在散骑侍郎任上。^⑥太元年间,殷康之子殷颢、殷仲文及侄殷仲堪是政治舞台上享有盛誉的名士。领国子博士的车胤为荆州南平士族,曾祖车浚为孙吴会稽太守,父车育任郡主簿。车胤的崛起有赖于桓温,《晋书》言桓温“以辩识义理深重之”,辟为从事,引为主簿,迁别驾、征西长史。^⑦桓温任征西大将军始于永和四年(348),^⑧完全主导东晋政局则在永和十年至宁康元年间(354—373)。^⑨孝武帝即位时,车胤为中书侍郎,后迁为侍中,代表桓氏参预机密。《晋书·车胤传》载:“时惟胤与吴隐之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。又善于赏会,当时每有盛坐而胤不在,皆云:‘无车公不乐。’谢安游集之日,辄开筵待之。”^⑩与车胤同“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”的吴隐之,其仕途发展也是缘于桓温的知赏。孝武帝一度欲用为黄门郎,^⑪正是基于他的桓氏背景。

“兴复国学”时,谢安“父子皆著大勋”,声势已高过桓氏。孝武帝排斥谢氏,以车胤领国子博士,隐含着借桓氏平衡谢氏之意。但车胤的作用只是暂时的,随着桓冲、谢安相继死于太元九年(384)、十年(385),桓、谢间的平衡政治终结,东晋形成了相权辅佐皇权的格局。田余庆先生认为,孝武帝伸张皇权、兴儒学,主要信用的是徐邈、范宁、王雅三位儒生。^⑫其中顺阳范氏与谢、桓、王诸高门均相对立,这正是孝武帝所看重的。

① 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,第364—365页。

② 《宋书》卷五五《臧焘传》,第1543页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九《孝武帝纪》,第232页。

④ 《晋书》卷七九《谢安传》,第2075—2076页。

⑤ 《晋书》卷七四《桓祕传》,第1947页。

⑥ 《晋书》卷二〇《礼志中》,第617页。

⑦⑩ 《晋书》卷八三《车胤传》,第2177页。

⑧ 《晋书》卷八《孝宗穆帝纪》,第194页。

⑨⑫ 田余庆:《东晋门阀政治》,第140—198页;第257—291页。

⑪ 《晋书》卷九〇《良吏·吴隐之传》,第2341页。

在桓温主政下,范宁之父范汪被免为庶人。^①太元十三年(388)谢石薨,^②谢氏请谥,范宁从子范弘之时任太学博士,议为恶谥:“贪以败官曰‘墨’,宜谥曰襄墨公。”^③《晋书·儒林传》载:“时谢族方显,桓宗犹盛,尚书仆射王珣,温故吏也,素为温所宠,三怨交集,乃出(范)弘之为余杭令”,“终以桓、谢之故不调,卒于余杭令”^④。与此同时,范宁“指斥朝士,直言无讳”,亦从中书侍郎任上被出为豫章太守。^⑤《晋书·范宁传》言“宁之出,非帝本意,故所启多合旨”^⑥,可见顺阳范氏为孝武帝压制谢、桓、王诸高门所借助的力量。顺阳范氏的政治主张被范宁上升到学术层面。《晋书·范宁传》言:“时以浮虚相扇,儒雅日替,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、何晏,二人之罪深于桀纣,乃著论”,“宁崇儒抑俗,率皆如此”^⑦。玄学风流是王、谢维系高门地位的文化资本,^⑧范宁“崇儒抑俗”实是釜底抽薪。范弘之给谢石恶谥正是“崇儒抑俗”的表现。孝武帝以范弘之及范宁之子范泰为太学博士,^⑨意在使太学成为伸张皇权的舆论阵地。

在太元年间的数次议礼中,太学博士维护了孝武帝的权威。太元九年(384)康帝褚皇后崩,康帝为明帝子,孝武帝为明帝弟简文帝之子,褚皇后于孝武帝为从嫂,孝武帝由此遇到了丧服礼制上的难题。太学博士徐藻议服齐衰朞,认为这符合孝武帝承认康、穆、哀帝系的政策。^⑩简文帝为桓温废黜哀帝所立,承认明帝一系有利于孝武帝展现其不附从桓氏的形象。徐藻,《宋书·礼志》原作徐恭,点校本整理者依据《晋书》《通典》《册府元龟》改为徐藻。^⑪《晋书》校勘记称:“徐藻、徐邈父子治穀梁。”^⑫若太学博士徐藻确为徐邈之父,则其对孝武帝的回护之意甚明,故而孝武帝采纳他的意见,“制朞服”^⑬。太元十二年(387)皇太子拜庙后,围绕着朝臣是否应该奉贺上礼,朝廷议礼。太学博士庾弘之议:“今皇太子国之储副,既已崇建,普天同庆。谓应上礼奉贺。”^⑭这一意见得到徐邈的支持。上礼奉贺国之储副,符合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政方针。

孝武帝“复兴国学”并没有得到门阀的配合。《宋书·礼志》言:“其年,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,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。而品课无章,士君子耻与其列。”^⑮国学明确以“公卿二千石子弟”为教化对象,但“士君子耻与其列”。约在兴国学一年以后,国子祭酒殷茂上疏陈述国学的情况:

自学建弥年,而功无可名。惮业避役,就存者无几,或假托亲疾,真伪难知,声实浑乱,莫此之甚。臣闻旧制,国子生皆冠族华胄,比列皇储。而中者混杂兰艾,遂令人情耻之。^⑯

殷茂的上疏表明孝武帝“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”的政策并未落实。“惮业避役”者充当国学生员,目的在于免役,故而入学后以“亲疾”为由请假,以致于国学“存者无几”。殷茂认为生源的“混杂兰艾”使“冠族华胄”耻于入学,要改变这种情况,须让“群臣内外,清官子侄,普应入学,制以程课”^⑰。这一建议未被孝武帝采纳,《宋书·礼志》载:“烈宗下诏褒纳,又不施行。朝廷及草莱之

① 《晋书》卷七五《范汪传》,第1984页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九《孝武帝纪》,第237页。

③④ 《晋书》卷九一《儒林·范弘之传》,第2363页;第2363、2366页。

⑤⑥⑦ 《晋书》卷七五《范宁传》,第1985页;第1988页;第1984—1985页。

⑧ 牟发松:《说“风流”——其涵义的演化与汉唐历史变迁》,《历史教学问题》2010年第2期。

⑨ 《宋书》卷六〇《范泰传》,第1615页。

⑩⑬ 《宋书》卷一五《礼志二》,第394页。

⑪ 《宋书》卷一五《礼志二》校勘记第25条,第414页。

⑫ 《晋书》卷三二《后妃·康献褚皇后传》校勘记第4条,第985页。

⑭ 《晋书》卷二一《礼志下》,第669页。

⑮⑯⑰ 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,第365页。

人有志于学者,莫不发愤叹息。”^①孝武帝“兴复国学”旨在“皇威遐震”,目的在于政治而非学术。以殷茂为国子祭酒,也是借助陈郡殷氏的地位来协调与高门士族的关系。既然造势已成,便无须再强迫门阀子弟入学。

结 论

东晋将太学视作“经国大务”,认为是“为治所由”。在晋元帝太兴年间的四年间,太学博士之制由五博士制发展为九博士制、十一博士制。咸康三年至永和八年(352)兴建国学,当置国子祭酒、博士各一人与助教十人。从太学博士、国子博士的选任来看,明经是首要标准。但在政治运作中,太学、国子博士主要当作政治资源笼络会稽士族与江州人物。对于朝廷而言,安抚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,事关在三吴地区的统治稳定。荐举江州人物的主要是颍川庾氏,他们在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过程中,试图借此赢得江州民心。总体而言,东晋前中期以博士征召处士,重在地方统治。

淝水战后,孝武帝兴复国学,“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”,试图树立对门阀子弟的教化权。孝武帝以殷茂为国子祭酒,以车胤领国子博士,通过援引陈郡殷氏与谯国桓氏势力,排斥在淝水之战中立有大功的陈郡谢氏。此外,孝武帝依靠顺阳范氏、东莞徐氏,以太学为伸张皇权的舆论阵地。太学博士范弘之“崇儒抑俗”,排抑谢、桓、王诸高门。在数次议礼中,太学博士徐藻、庾弘之等维护皇权。

大致以淝水之战为界,太学、国子博士在东晋政治脉络中的性质与意义,前后有所不同。前一阶段,博士官职被视作政治资源运用在地方统治中;后一阶段,博士的议政权力及太学、国学的政治象征意义,被孝武帝用以调整与门阀的关系。东晋“儒官”的选任虽以明经为前提,但其性质仍然是以解决政治问题为指向的人事安排。因而,在考察其学术性的同时,也当注重其政治性。

(责任编辑 孔令琴)

^① 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,第366页。